《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始记录稿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

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一个非常开明的内部讲话，就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精辟的论断。这个讲话本意就是给群众民主权，让群众讲话，支持群众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避免在我国也出现类似“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态。讲话出来后，社会反响很好，群众和民主党派中的友好人士，都积极响应号召，以各种形式，包括写大字报，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请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里。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完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平时开会我都是用正常文字记录，但这次不同，一开始我就被主席的讲话吸引，觉得不能漏得太多，就破例启用了自己的速记法。我是很赞成这个讲话的，我自己的记录又不是文件，我就没有交出这个记录。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的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行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作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继伟就掲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毛主席的这个开明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通澈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逄先知、金冲及他们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641页还引用了傅雷这封家书的部分内容。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了。

附录：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始内容(根据戚本禹个人-记录整理)

**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

毛泽东

同志们：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占去我们的时间很多。

问题很多

一、两类矛盾

有两类问题，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之间的矛盾。事实有两个问题，不单是一个问题。今天重点在人民内部矛盾，谈时两个问题都要谈。

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不同。过去有两个口号：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敌我：多少年来，我们讲的主要是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我们自己。分清是非是将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内部的是是非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是非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如我们与蒋美也有是非问题，谁是谁非。是是非非，但性质不同。普通习惯的说法一般说是敌我问题。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日报»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时，毛主席转向摄影记者插话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篇文章讲了两种矛盾，但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敌我矛盾，很少说人民内部问题。对人民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未作分折，只作原则说明。文章说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缺点，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区别。专政管什么?专政管对付与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压服敌人，不完全是镇压。比如不给选举权、不让他们自由宣传、不准自由出版报纸，不让美帝--他们的主子在我们这里出报纸等等。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不给选举权，这都属专政范围的问题。这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捉、杀、管都要经过人民。人民内部要讲民主，不专制，不杀头。专政不适应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不属于专政范围。人民不能自己专自己的政。只要不是敌人就是人民，就不适应专政。人民有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的自由。所以宪法写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民主有大民主和小民主。波兰、匈牙利有人主张搞大民主！几十万人在街上闹！专政有少数人对人民的专政，有人民对敌对阶级的专政。在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或民主运动都是对敌对阶级的。有些同志，党内的，有些朋友，党外的，搞不清这件事。另一些人则是有敌对情绪。比如有人希望用大民主搞跨政府，学匈牙利，整共产党才开心。有的大学生发表声明：要杀共产党，杀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共产党太厉害，大家活不下去啦！他们想让我们混不下去，知道其厉害。其实是过甚其辞，真叫他杀，杀不了这么多。叫喊杀共产党，不过是表示其心理状态。有人认为我们的民主不如西方。他们思想幼稚，不了解实际，认为西方民主，议会民主好。人民代表大会比议会差。说民主要有两个党，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两党互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日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不同意我们说的民主是手段，或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马列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是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为经济基础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才是目的。政治、文化、思想，所有上层建筑都为这个经济目的服务。有的人一听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就不舒服，只有说民主是目的才高兴。有人说外国自由很多，我们的自由很少。我说外国的自由并不多。议会自由不过是摆个样子给人看。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打埃及，工党不要。就像艾登打埃及的自由，艾登是有自由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抽象一般的自由，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赛尔有纳赛尔自由，要看什么阶级什么集团。所以世界上只有阶级和集团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

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是错误的。以行政命令和武断压制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效力和有害的。宗教也是思想范围的问题。也不能以行政命令方法解决。唯心主义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思想问题应采取讨论、辩论、批评、教育、说服的办法，使人们相信你。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矛盾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没有谈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不应放在第一类敌我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应放在第二类人民内部矛盾里，因为它不是敌我矛盾一类。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毛主席对服务员说。“茶水没喝完，别倒掉，要节约。”)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官僚帝国主义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对抗性处理恰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由第一类对抗矛盾转化为第二类非对抗矛盾。非对抗性，如果处理失当，如果不采取团结改造的方法。则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势必走向对抗，成为第一类矛盾。由第一类变成第二类矛盾的办法，是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所以是民族资产阶级。

现在讲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这是个新问题，历史上没有突出过，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少。列宁也是简单说到过，他说到社会主义时，对抗消灭，矛盾存在。即人民内部还有矛盾。列宁虽然说社会主义还有矛盾，但他没来得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例如人民内部矛盾有否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应该是有可能的，但列宁却没有能详细考察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死了，时间太短。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分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不满意政府，批评共产党，这是人民内部的批评，应与敌人的攻击有分别，斯大林却在很长时期内对两者的情况不加分别。这是苏联同志说的。他们说，那个时候，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提出批评，谁批评了党和政府就是敌人，就有坐班房和杀头的危险。两类矛盾容易混淆。把两类矛盾混淆，我们也干过。在肃反中我们有些地方把好人看成坏人，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当反革命来斗争。有没有，有。从前有，现在也还有这类问题。但我们有一条：有错必纠，斗错了要平反。并且从延安时就有内部规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对反革命不管真假大小都一个不杀。现在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因为极少数还要杀)，实际上大多数是不杀的。这一条好，错了有挽回余地。两类矛盾容易混淆。在这个问题上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右倾。即认敌为我，不分敌我。现在还有。广大人民看是敌人，他们是朋友。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有人提议释放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这人是襄阳市的人民代表，原来在襄阳工作过，过去与康泽是朋友，他在康泽问题上思想感情就与广大人民不相同。还有人老替帝国主义说好话。简直是美国月亮都比中国好。其实美国月亮和中国月亮都一样，我赞成它是一个月亮。美国月亮比中国好我不相信，不赞成。为什么会好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种倾向是左倾，带括号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份。斯大林就是这样，我们也有人这样。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肃反中常会出现这种“左”的倾向。这是括号中之左。

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提出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我们提出的这个公式，详细地说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当时提出这个公式是为了解决党内教条主义与广大同志的矛盾、教条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教条主义是从西天取回来的经。西天就是斯大林那里，即是从斯大林那里传来的，他们处理内部矛盾的方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处理内部矛盾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以牙还牙。我们用的方针是团结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1942年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经过三年。到1945年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

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愿望呢?因为没有这第一个团结愿望，批评斗争就斗乱了。然后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无情斗争，严厉打击!没有团结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准备不行。因此这个公式必定要把团结的愿望放在第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后来推广到党外。到北京我听说民主党派处理内部问题也采取这个方针，不是要么是你，要么是我，你死我活。以后，对工商业界用这种办法也灵。195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商会议，他们团结批评了一个月，结果很好，未伤感情，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对资本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对剥削阶级也可以采取这方法。不过我看对台湾采用这个方法有困难，现在台湾蒋介石与胡适斗法，对他们这样的剥削者不适用。因为工商业者与他们是两类剥削者，对前者可以用，对他们不适用，道不同，不和谋。对他们从团结到团结不可能。对民族资产阶级从团结到团结有可能。对犯错误的人，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宗教界、唯心主义者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推广这个方法。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商店、机关都可用这个方法，还可以推广到对解除武装的敌人即俘虏，对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没解除武装的不行，对没有解除武装的，还必须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对已解除武装，可以用这个方法。对劳改犯，对解除武器的特务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改造他。改造就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你还要他活，不消灭他。1956年5月2日我在最高国务会上讲了十余条，十条中二条，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非关系，讲的就是两类矛盾。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内部的相互矛盾关系。半个钟头讲了一个问题，这是开场。

二、肃反问题

这是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问题。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的肃反工作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坏呢，我看我们比起苏联、匈牙利做得好。苏联太左，我们不是比别人特别聪明，而是自己左过。我们过去在南方根据地学苏联的办法，吃过亏，后来取得了经验，纠正了。因为有了经验，所以比别的国家做得好一些。在延安时我们就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到北京又有许多进步，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我们和苏联是两条路线。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肃反路线不好。但也有两面。一面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一面抓错了，杀错了许多人，其中还有很多重要人物，这不好。联共十七大，50%的中央委员，8%的大会代表受牵连。我们有基于此，没干这些事。过去杀错的也有，1950~1952年也有杀错的，杀五类反革命也有杀错的，但根本没有错。肃反总共杀了70万，前年杀了7万。去年杀得少。

人们说我们反复无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50~1952年我们大约杀了70万人，香港报纸说杀了2000万，多了1930万，“纣之不善。不如斯之甚也”。也不必对帐了。哪里有几千万，70万则有之。

杀一些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不杀他们人民出不了头。他们都是些霸王、南霸天、西霸天之类的。杀了他们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人民要杀的。现在有的朋友要翻这个案，翻不得！翻了农民要拿扁担、工人要拿铁条打我们，这是吃不消的。

匈牙利对反革命是根本未肃清，对革命同志倒错杀了几个，像伊拉克。反革命杀得少所以出了今天的反革命事件。外国人也觉得是如此。匈牙利事件后，我们国家稳固。外国人也说我们稳固。我们自己也觉得稳固。匈牙利事件后，中国有没有风波?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小波浪，春风吹微波，引起大波浪没有?没有。为什么?很多原因，肃了反，反革命没剩下几个。还有几个，但很少，这是原因之一。

匈牙利事件没有在中国引起大波浪，第一条是我们的党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军队和干部队伍也都经过了革命斗争和锻炼。党在人民中生根，军队有战斗力。政权是从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解放的。民主人士经过斗争和锻炼，他们长期与党共患难。中国学生经过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锻炼。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总之，人民经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长期斗争的锻炼，包括知识分子都在进行教育、改造。再有反革命肃清得差不多了，这些条件匈牙利都没有。当然还有别的因素，比如经济措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团结民主党派，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等。

现在我们的大学生80%左右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匈牙利大学生60%是工农子女。但他们大游行反对政府，我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拥护我们。我们没有裴多菲俱乐部，除了少数人讲怪话，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赞成社会主义，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都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比较起来我们的肃反方针没有苏联的左，也没有匈牙利的右。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没有过火，有没有漏掉?有。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依靠群众的肃反路线。虽然有毛病，但比较好，比苏联公安部单枪匹马的好。群众经过斗争得了经验。搞错了，有犯错误的经验；搞对了，也有搞对了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拿来能教育自己。

我们希望肃反工作所有的毛病都能加以纠正。中央已发指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中央决定分步骤地在今明年搞个肃反工作大检查。我们建议这次要全面检查一次，从中总结经.验。此项检查，中央由全国人民代表人会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主持，地方由地方人大常委和地方政协主持。个别检查收效不大。有人已写信向我们反映过。

我们的目的，这次全面检查的要求：(1)不要泼冷水，要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参加肃反工作的干部。泼冷水不好。不要使干部抬不起头来。(2)有错必纠。包括公安、检察、保卫、劳改部门的工作；都有许多毛病，有毛病就要纠正。这次检查由人大、政协领导主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都参加，把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这对法制工作很有帮助，省、市、地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凡身体好的都参加。

总的情况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意思。

第一句话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没有反革命了，可以把枕头整得高高地睡大觉了，天下太平。这不对。地球上的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党支部副书记。(叫什么，应该给他扬扬名)哦，叫马国风，秘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张贴，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事实上是这个共产党员赞成匈牙利反革命暴动，赞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所以肯定有反革命，这就是个漏网的。当然，查下来这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只是有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不一定是反革命，不一定是蒋美派来又留下来读书的。北京学校里的反动标语不少，没有反革命了的思想不对。第二句话是“但不多了”。不多就是很少了，这两句话都应该肯定，不肯定第二句话的结果会搞乱。反革命很少，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反革命。总之不多。

是否大赦?很多朋友对此问题大有兴趣，很好。但我是消极分子，对大赦我不积极，没兴趣。这就不免和有的朋友有点小摩擦。大赦可赦不得。有人说，“宪法有规定国家主席有权大赦，可你毛主席又不赦”。是，我有权利，但我不主张大赦。我们可以多做些赦免文章，但不要这大赦名义。大赦就是全部赦放。如果大赦了，康泽等人放出来，老百姓反对，犯人也要讲话，大的犯人赦了，小的犯人也要赦。公安部、人民法庭都可以不要了。有人说台湾的蒋介石都可以赦，为什么康泽不能赦?谁说蒋介石可以赦，人大未作决议，我也没发布命令。我们是建议：台湾起义，祖国统一。向傅作义将军学习，取得赦免权。最近我不称蒋介石匪了，可是蒋介石依称我们匪。他们对民主人士也不客气，称张治中为张逆治中。大赦不得，是否就一个不放了?不，放，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只是不发报。不宣场。

溥仪怎样处理?人家是皇帝，是我的顶头上司，上45岁的人都是他统治下的臣民，但是他得罪了人民。将来要放，现在不能放。现在放了，人民不谅解，无益，对他没好处。那么请他参观参观，看看报，研究研究问题。请他参观天安门、工厂、大桥，也可以在人民监督下做点工作。改悔较好的犯人逐步放一些，但不要登报，这些都要取得人民的同意。人民要是反对我们就不得了啦，他们拿起扁担、铁条，打我们，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

三、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合作化。去年下半年，在高潮热情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问题。上半年优越性很大，下半年优越性就没有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是小风，春风吹微波，说合作化不行。今天文件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这是个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的好典型。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成长，什么事情都有困难，新事物的成长发展都要经历曲折和困难的道路。人民不习惯集体生活，特别是富裕中农，最不习惯。拥护合作化的是贫农、下中农。对合作化不满的，除了地主、富农就是富裕中农。很不满的占全体农民的1-5%。因为合作化头几年干得比他们单干时要差，不能雇工，生产、生活又不合他们的意。合作社要多少时间方能巩固?大概要五年时间。全国大多数合作社历史才一年多，一年多时间要那么好不行，要五年时间才能逐步巩固，减掉去年一年，还要四年。王国藩的合作社在热河遵化县，靠近长城，他们的合作社办了五年才巩固。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有改善。解放以来，农村共增产1千4百亿斤粮食，1949年粮食产量有2千2百亿斤，增产1千4百亿斤，就达到3千6百几十亿斤。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说农民生活没改善并不是事实。但一部分农民还没改善，还有缺粮户。缺粮户大约占农户的5~10%，还要三四年，缺粮户才能消灭。那时才能只统购不统销。几年内只增产不增购。现有的粮食大部分是统购来的，公粮只是小部分，两项加在一起共有812亿斤粮食，在农村销了390~400亿斤，400多亿斤作为供应城市和出口预备粮。这样农民手中还有不少粮食，说农民生活没改善不是事实。现在下面一片叫苦声，有的干部也这样讲，他们实际是代表富裕中农立场。干部家属回家后变了富裕中农，影响很厉害。民主人士也受其影响，民主人士也有富裕中农亲戚。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我看合作化还是有优越性。你们看王国藩的合作社就有优越性。

为什么波兰、匈牙利搞起来的合作社今年一阵风吹去了大部分?哥穆尔卡演说前波兰有1万几千个合作社，现在一万多个吹没了，只剩下1000多个，削去了90%，匈牙利也一样。

我们所以能搞起合作社，而且这样快，有这几个原因：

(1)中国地少人多，穷得要命，合起来比较好。

(2)我们党对合作社采取了分几步的方针，逐步走。

我们国家与苏联不同，苏联合作社后几年不增产，我多年增产，去年增产200亿斤。

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叫苦，影响党内外一些人跟着他们叫。还有一部分缺粮户也叫，他们是真正生活苦。

再就是城乡比较，工人与农民生活悬殊的说法。

现在农民平均年收入60元，有高于60元的，有低于60元的。低于60元的有40~50元的，有低于30元的。30元的很困难。我还听说有一家四口58元过一年的，这是最困难的了。也有一家年收入100多元、200多元的。甚至有1000元的，有一家4口人，年收入4000元。这样发展下去。几年后你们看工人比农民苦，农民比工人富。

工人中的粗工工资不适当，一个人一月30元。工资不适当，刺激了农民。农民与工人，城市与乡村生活不同，农民一家六口，平均每人年收入60元，可以过生活了。如果人均年收入240元，那生活就相当好了。乡村里很多东西不用花钱买，城市里样样都要钱，把两种情况混起来不适当。

四、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

对这问题我没有研究，但鼻子也闻到了一点气味。这方面也有小风波，也是春风吹绿波。比如说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了，说资产阶级跟工人、农民差不多了，不需要改造。少数人还问工人为什么可以不改造?谁说工人可以不改造!“阶级斗争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话，工人为什么也要改造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工人阶级不解放六亿人，自己也不能解放。我们在座的人每年都有进步，就是改造来的。

我自己从前是知识分子，信过佛教(毛主席指着在座的赵朴初说，“就是你们的教，我信过”。)拜过菩萨，跟着母亲到南岳还愿，也信过无政府主义，那时我想无政府主义多好啊。还信过康德的唯心论。我这个人多复杂啊。后来马列主义把我的脑子改变了一下。几十年了，主要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已啊。难道资产阶级就不需要改造了?资产阶级就那么高明?我都需要改造，你不要改造!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总有两面性，有优点，有缺点。只有一面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面。而且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摘帽子，即使摘了帽子，还要思想改造。大家都要学习。全体工作人员也要学习，学习是大多数工商业者的愿望。不学习，不合乎多数人的愿望。有人参加了四十天学习，感到自己学习以后思想面貌一新，与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不像过去互相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有人害怕改造。美国把我们的改造叫洗脑筋。其实美国才是真洗脑筋，我们还文明点。照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的理论，连宪法都要修改。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一样了，那么宪法上的工人阶级领导也要取消，都一样了，还领导什么?要声明一下，这种不需要改造的说法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问题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同全国六亿人民一样都有很大进步。工人、农民有很大进步，商业者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也有些学生有不正确思想。他们讨厌马克思主义，刮歪风，发怪议论。他们只顾钻研业务，念书只为了将来多挣薪水、吃饭、讨老婆、生孩子。什么政治理论、国家前途、人类理想都不需要，马列主义也不顶事了。好像从去年下半年起，这些都不时兴了。对他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要进一步改造自己，不要逃避改造。过去的改造方式有些粗糙，伤了人。这要改进，每个人都要努力学习。除了专业知识外，思想政治也要有所进步。学一点政治，学一点马列主义理论很必要。没有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认为只靠专业知识，就行了，就一辈子吃不完，这是不对的。最近是政治工作减弱，高教部应管政治工作，青年团也应管政治。过去讲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现在有些人只要二育(智育、体育)，不要德育，这不对。所谓德育，指学习马列主义，学政治。重视政治工作，德育、智育、体育三者都要。高教部不管政治工作不对，应该管。党和青年团也要管，要有德育。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铺张浪费又来了。共产党就这一套，过几月就没事了。”是不是这样?反对铺张浪费真的只有一次。仅仅在三反运动时整了一次，以后没有再反。1955年提倡节约主要是为了解决非生产性基础建设的浪费问题，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这一次节约搞得对。全国共节约了20个亿。但也有节约不当的，影响了工程质量。但许多工程成本降低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很大的。这一次节约别的部门没搞。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搞增产节约，这不，刚一开始，沙发地毯、桌椅就没人要了。这次要彻底，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来。就像洗脸一样，各位洗脸一年洗一次吗?据我所知，每人一天至少洗一次，还有洗两次的。为什么?为了尊容漂亮起见，每人天天都要洗脸。反对铺张浪费，倒不能经常进行呢?反对铺张浪费和洗脸一样要经常进行。不是一年一次，一星期一次，而是要经常进行。人不是别的动物，而是高级动物，每天要洗脸。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人士，总之全国六亿人民都要像每天洗脸一样，来一个增产节的，反对铺张浪费。去年评级出了毛病，有些人升官发财思想大发展，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些人也要洗脸。

七、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这一点是全世界各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生产棉花、布匹都有计划。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计划。人对什么都有计划，就是对生孩子没计划。无政府主义、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人类要趋于灭亡，提前否定自已、消灭自己。如果中国六亿人增加个十倍，到60亿，那时，小孩多，人口多，加以卫生条件好，有防疫针打，大家都年高德劭，又都是大学专科毕业的专家，文化上也比我们高明，岂不很好。可是人多吃得多，60亿人到时候没东西吃可不得了!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我建议政府设立一个部门，叫生育计划部好不好?设个委员会也行，叫节育委员会。也可以组织一个人民团体管这件事。还要拨一笔经费，作为加强宣传和解决节育的技术问题的费用，这些就不多讲了。(少奇同志插话：生育要有计划，一对夫妻生三个孩子就是错误，生四个严重错误。)

我讲战略方针。要认真救灾。全国有很多灾，每年有灾，要拨粮，给他们救济粮。要搞好统销，统销苏联没做过，我们在全国有计划地统销粮食。还有安排就业，统战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去年就安排300万人就业，按计划，只能安排80万人，多了220万人，因此麻烦很大。工资出去了，发了1800万人的工资，增加了300万人。失业只能逐步消灭，还不能完全消灭。广州、上海失业的人很多，要想办法。有人提出三个人饭五个人吃，可以考虑。人口多薪金低，我们高级人员是十年不增薪，死不了人。以不死人为原则。连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这是因为今年计划中那点钱，只能办这点事，所以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我提出这个意见有些犯众，但死不了人。要增，给下面的同志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40%的学龄儿童，到了学龄上不了学，人民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人民政府不能一步登天。另外，今年还有400万高小毕业生升不了中学。没地方、没经费。有80万初中生升不了高中，9万高中生升不了大学(这些统计数字不一致，早晚市价不同)，大学生升不了科学院。就业也成了问题，80万人等待就业!这么许多人等待安排。就象排队买猪内一样。等在那里。这是相当大的问题，大家讨论讨论。今年国家的钱就这么多，只能安排这些，怎么办?

八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人民内部矛盾，列宁说过，对抗消灭，矛盾存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里说没有矛盾。列宁那时不能全面考察问题。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但他在1952年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中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矛盾，处理好可以不对抗，不发生冲突，处理不好会发生冲突。他已看出了这一点。

苏联建国40年，我们落后于苏联许多年。我们1927年开始在一些地方建立根根地，也有了30年的经.验。根据苏联和我们的经验，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矛盾的存在。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集体、个人之间矛盾。社会主义没有剥削，都是公有制，不过分全民、集体两种罢了。斯大林不承认矛盾的提法缺乏辩证法，严重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说他犯了局部错误。就是指这一点。在他影响下«简明哲学字典»(尤金主编的)同一性这一条引用形式逻辑的同一来分析哲学上的同一性，没有弄清形式逻辑的同一和辩证逻辑同一性的区别。说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等矛盾都没有同一性。恩格斯讲述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实际上对立的东西不能没有统一，只有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都有同一性，否则就是错误的。斯大林死后苏联哲学界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有所改变。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界有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观点。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无产阶级。资产者、无产者不变化，战争与和平、生与死不能变化。我们的说法不同。我们认为资产者可以转化为无产者，无产者可以转化为资产者，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生可以转化为死，死可以转化为生。尽管斯大林在哲学上形而上学，否认对立的变化，但后来他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有矛盾，处理不好矛盾会转化为对抗。这就对了。实际上斯大林是差差答答地承认了辨证法，吞吞吐吐地承认了辩证法。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都是存在的。政治、法律、哲学、意识形态都应当为经济基础服务，要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就要发生冲突。

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毒草也可能放出来；百家争鸣，唯心主义也可以争鸣。只要不破坏团结，不秘密组织团体，开放一点可以。我们国家面积大，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开放那么一点不要紧。

香花和毒草。百花中本来就有野草闲花，还有毒草。只要粮食大米，不要野草不行。每年农民都要除草，年年这样。禁止一切野草生长不行，下命令不准一切野草生长也不行。事实上有野草就会有毒草。只许香花生长不许野草生长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本身就不是香花，不是马列主义，它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方法上是形而上学，对社会、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形而上学老早即有，特别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发展，中国也有。

香花与毒草难分别。新生事物在生长过程中都要遭受打击，都要经历这种困难的道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还被人认为是野草和毒草。同盟会、孙中山在清末也被认为是毒草。共产党长期来被称为匪、土匪。对我们这里开会的人，香港、台湾仍称之为匪，即毒草。孔夫子老先生一生不得志，当时他也是一颗野草。耶稣当时也为社会所不容。释迦牟尼，佛教的开创人，开始时社会上对他亦不欢迎。马丁•路德的新教开头也不为社会所承认，被看作是毒草。«西游记»里的孙行者为何被封个弼马温，就是玉皇大帝们认为他是毒草，但他对自己的监定是齐天大圣。封建社会有出戏，大英雄薛仁贵封了个虎头军，那是他的对头张士贵对他的监定。欧洲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文学著作，生前都不能出版，死后才被承认。伽利略也一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人家也不承认。我看过一本科学家的传记，安眠药的发明历史就很曲折。在法国先有了名，中国第一个吃的是李烈钧。吃后，说是好东西，李烈钧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死了。后来美国舞蹈家邓肯生第二个孩子时吃了安眠药，减轻了病苦，这才推广。这一切说明世界上一切科学发明、一切新事物的成长，都会有困难。司马迁写的«史记»，开始也不被承认。只好藏之名山，后来才传诸后人。新生力量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越困难越坚强，越顺利越脆弱。我们的社会是新社会，但新事物也会碰到顽固保守力量的压制，还是有困难。死官僚、顽固势力是新生力量的对头。应该说在新社会里新事物的成长比旧社会条件要好。但新生事物被社会承认，也要经过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没有与困难打击的斗争，新生力量永远成长不了。这是历史规律。

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也有很多问题。斯大林本来是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打下去变成了毒草。现在又香了一点了。

最近，有些批评有问题。钟惦棐用假名字写文章：«电影的锣鼓»否定一切，影响很大，台湾很欣赏，全文转载。陈沂及其部下陈其通四人一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怀疑百花齐放，说百花齐放也没见大作品。这样的结论过早。陆定一百花齐放的文章去年七月才发表，离陈沂同志一月的文章时间才五个月，百花齐放的大作品怎么写得赢?对这种意见，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我表示不赞成。«人民日报»至今没有发表文章反批评。是什么意思，不赞成我吗?或者有困难?有困难应请示中央呀，这里有没有«人民日报»的问题?

钟惦棐是右派，这几个同志是左派，为党为国忠心耿耿。他们怕百花齐放后文艺界会出问题，他们对形势估计错了。那文章，我不敢领教。现在四个人作了检讨，陈沂在«文艺报»第四期上也表了态。他们的过去还是好的。«文艺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登了陈沂的文章。台湾喜欢钟惦棐的文章。发出来了。在外国，罗马尼亚发了陆定一的文章，«真理报»不登。陈沂的文章«其理报»喜欢，登出来了。这也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喜欢机会主义。这种现象恐怕值得评论一下吧。有个青年作家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原来是工厂的团支部书记，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也发生了问题，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党员与党员打架。有人说这篇东西一无是处。其中有马寒冰。还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没官僚主义，典型环境选得不当，那么说是地点选得不好，如果选上海就较妥当。马列主义我看得少，没有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的说法。中央还是会有官僚主义。过去中央就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高饶等。这样的批评不对。马列主义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马列主义还要发展，不是说过就完了，还要继续发展，按具体情况有所发展。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

中国六亿人口，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农民五亿，手工业者二千多万。小商贩五千万。资产阶级五十万人。小资产阶级五亿七千万人，这是客观存在，这些人一点意见不让发表，那怎么行?

嘴有两个作用，一个吃饭。一个讲话(发表意见)，只准吃饭不准讲话，怎么办得到!中国是个小资产的大国，从存在出发，小资产阶级意识一定要反映。他们千方百计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教育，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让他们不表现，只能在表现时与之辩论。写文章批评，不能形而上学。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有辩证法。

老干部能不能批评?在马克思主义书上从来没说批评有新老干部之分。或者只能批评新的干部，不能批评老的干部。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上平等。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的问题上也应该平等。老干部因为老了就获得了不受批评的权力，我看不行。活时不批评，死了也要批评。孔夫子死了几千年还受批评。五四运动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现在孔夫子好了点。斯大林死了也被批评，批评是不能分官职大小、老幼长短的，死活都可批评，错了即挨批。

靠老资格吃板。老资格可以吃板。就是因为老，活了老大年纪没有死，即有一种资格，可以吃饭。老资格有种作用，跑龙套，摇旗呐喊，能起这个作用。(鼓掌)80岁也能起这种作用。在座的梅兰芳，(毛主席插问：来了没有?)80多岁还可以跑龙套。«西厢记»我唱红娘不行，唱老太太行。我唱主角不行，主角是周总理。都是你唱，也不行，大家要赶你走。老者只可以唱一回。但老资格不管怎么老，办事要正确。活到99岁都正难，到100岁犯了错误，做了个大混蛋也不行。拉科西就是如此。一个人不能因老资格办错了事不受批评。

新干部有一样，青年的缺点也应该批评教育。比较起来对青年人应同情。列宁说青年人因为年轻，上帝会原谅他们。在«左派幼推病»的书里说的。上帝所以会原谅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年轻。对老年人应该严格一点。对青年也要严格，但要帮助，要长期耐心的教育。否则，只对青年严，老太爷就太舒服了，不好。

许多人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级干部中十个人中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对这个方针思想不通。真正思想通了的同志是少数。对唯心论应该给以批评，对文艺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批评。但批评要适当，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教条主义的批评解决不了问题，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助长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批评是人民内部的批评。这是一个人民内部自己教育自己、团结自己、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

正确东西都是在与错误的东西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来。新东西都是在与旧东西的斗争中才能发生。中国的马列主义即是在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的不好东西作斗争中成长的。

出点问题没有什么可怕。野草闲花长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怕。年年都要长野草闲花。你为什么不准。而且野草闲花中就可能有好草好花，不准生长不对。野草闲花生长了几十万年，不是这几年方生长的。如果我们规定什么花都不准开，很可能这不准开的花中就有香花。就是马列主义的香花也要在批评斗争中才能成长发展。旧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毒草，只是有些是毒草。有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

对长期共存、共同监督的方针，有人也不赞成。这也是形而上学。这个问题我也讲了许多次了。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百家争鸣，长期共存，对犯错误的要治病救人。但一到写文章就忘了。不治病救人了，而是一棍子打死。我希望大家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提倡种牛痘，我种过牛痘。培养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人才能强壮。没害过病的人没有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很危险。经常害点病是好事，能产生抵抗疾病的能力，培养免疫力。

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的问题

现在还缺乏全面反映学生闹事的材料。去年大致有20几个学校7000多个学生闹事。昆明航空学校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办法办学校，不赞成官僚主义。他们反映学生闹事的材料，分析得相当好。他们说学生的闹事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青年学生的幼稚无知、不懂事。学生不知道艰苦奋斗，领导不懂得关心教育。而且对学生的实际困难又没能及时解决。他们不能与学生共甘同苦，反而采用各种办法欺骗学生。

工人罢工去年有五十几起。小的十人、二十人，大一点的有一千人的罢工。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发生。罢工、罢课、拿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这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波兰的影响。只是匈波事件以来。事情不好办。

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怎办?我看有四条办法：

(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恰当处理矛盾。

(二)官僚主义未克服时，让闹不让闹?两个方针：一是不让，凡闹者即是造反。我看不妥当。闹事者有反革命，但不能说引起闹事的，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们的领导有问题，工作有缺点，甚至是官僚主义，不懂教育，不会当领导，没做好工作。二是让闹。我看让闹，要罢课即罢课，要罢工即罢工。应该解决问题嘛，是你没解决问题嘛!(这时毛泽东对施复亮说：施复亮你是闹事的吧?)

(三)闹起来后草率收兵好不好?刚闹了两三天还没过上瘾，怎么行?闹得不够。让他闹够。闹了两三天还没闹够，没闹过瘾的，当局即要收兵。不对。要闹，让他闹个够。我也是闹过事的。闹得不够，难以解决问题。闹得不够再闹，一星期不够两星期，两星期不够三星期，三星期不够四星期，让他闹个够，够了即不闹。把这过程当做一个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领导要积极对工人学生进行教育工作，补足政治课，把罢工、罢课、打扁担的过程，看做是克服官僚主义和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

(四)对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要不要开除?

除个别的外。如拿刀杀人的要坐班房外，不打、不关、不开除，开除罢工、罢课领袖是资产阶级的办法。对罢工、罢课领袖人物还是留下来好。正确的、错误的都留下来。错误的留下来当教员，即使是特务也留下来(只要他不杀人)。一个单位留下个把特务有什么不好。不要一定搞得干干净净才舒服。清华大学闹罢课的领袖也要留下，即使是教员也留下，有名的更好。这是难得请到的人。

不要开除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一反国民党其道而行之。

闹事还会有。中国的问题特别多。人心不齐，想法不一。许多人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人来自五湖四海，许多人文化不够，容易犯错误，文化多的知识分子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犯起错误来更大。我们党在历史上左倾、右倾错误都犯过。犯错误的人如陈独秀、李立三都是知识分子。错误会有，矛盾冲突不断。我们要把闹事和正确处理闹事，当做调节矛盾的一个方法。

十、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说是又好又不好。商品有两重性，这事也有两重性。和匈牙利、波兰事件一样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不好，又好，又不好。匈牙利闹事不好，但闹事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首先是，匈牙利局势稳定下来了，现在匈牙利的局面要比过去好。再者是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很大的教训。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件事，第一当然不好，但第二好。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反苏反共，锻炼了各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机关被打乱，瑞士共产党领袖躲到山上，找我大使馆。大批共产党员离开党。英国、荷兰、比利时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脱党。他们脱党是好事，纯洁了党。主要方面是好的。

批评斯大林也有两重性，两面性。一方面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好。好的是揭了个人迷信的盖子，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因揭的方法不对，一棒子打死，引起了世界大半年几次大风潮。引起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其他困难。这个问题在苏共二十大时我们向苏共同志当面讲了，只是在公开文件中没讲。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不当，也反映了苏共的大国主义。

美国不承认我们也有两重性、两面性的。不承认我们不好，联合国我们进不去，好像我们不存在，但又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这个看法我和朋友们讲了，就是没能说服他们。最好再过六年承认我们，再过十五年也行。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好了，他们悔之晚矣。我是美国不承认即高兴；他要承认我们，我就担心。英中有外交关系，也是这样，他承不承认，我们都不放弃台湾。他不承认我们，我们就有话可说。有文章可做。

出了几篇有错误的文章，也是好事。对上面讲过的错误文章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反批评的根据，使我们有了反批评的对象，这样反批评才有可能。«电影的锣鼓»文章说没有大作品，没有好影片，怎.么办?大作品是会产生的，是好是坏，那是另外问题。物极必反，坏事多了，好事即来。这是辩证法。辩护法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我们的老祖宗“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位老子，就有坏事会变成好事，好事会变成坏事的观点。“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古代甚至有人家烧了房子，客人反而去贺喜的。因为烧房子的坏事对这家人会变成好事。

日本人打进中国，中国失败了。但在中国的失败里包含着胜利的因素。这样，中国的失败会转化为胜利，日本的胜利会转化为失败。苏德战争也是如此。战争开始时苏联大片国土丧失，希特勒兵临城下，但希特勒的胜利包括着失败，苏联的失败包括着胜利。日本代表团来中国向我们说抱歉，我说你们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帮助中国团结起来。打败了日木帝国主义。

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起来，也有好、坏两方面。

中国是一穷二白，一穷是生活水平不高，二白是文化水平不高。这都有两重性。我们的革命就是靠这两条，一条穷，一条白。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生活富裕、文化水平又高就难以革命了。要革命还是要依靠穷苦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群众。我不是提倡文盲。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马上打怎么办?散了会就打怎么办?我看，要打就打，要闹就闹。你们要有准备，准备开完会就发生世界大战，人类被消灭了一半?或者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会这样。我和印度、巴基斯坦总理争论过。总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条，不欢迎；第二条，不怕。

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卷入大战的不是几亿人，而是十五亿、二十亿。最后是帝国主义消灭，社会主义胜利。

战争有两面性，有不好的一面、也有使人民觉悟起来、紧张起来闹革命，造成革命大爆发的一面。总之是两面性，有破坏的一面，有调动人民积极性、提高人民革命觉悟的一面。

真打起来，不要怕。小米加步抢都能打，何况我们还有新武器。不要听见世界大战就愁眉苦脸，那连蒋介石都不如了。对战争，蒋介石并没有哭丧脸。蒙哥马利说全世界只有两个大国消灭不了。这就是苏联和中国消灭不了。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昆仑山，都消灭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对我们也有好处。我前面说过，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向我们承认错误，对我说对不起我们，我说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你们教育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教育了中国人民反对你们。

世界上的事物，对立双方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国际上对立双方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就像一个曲子中讲的，“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比一对泥人儿，将来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调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世界也是两个泥菩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主义世界有我们的人，社会主义世界有他们的人。匈牙利有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有个人听了美国之音，买了食品躲在屋子里等世界大战。苏联也有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我们中国同样有人喜欢听。

总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态度是：

第一，准备打。打起来就准备夺取最后胜利。而且是加一倍的胜利，现在是九亿人口赤化。那时变成十八亿。

第二，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我看可能有十年、二十年。也可能更长。

打，就建设停止，专门打仗。但现在看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现在在搞什么?互相渗透。颠覆波兰、匈牙利。现在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美国正在争夺英国的殖民地，争夺亚洲、非洲。这是世界主要矛盾。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力量：

1、社会主义力量。主张和平，反帝。

2、民族独立力重。他们在和平与反帝问题上，可以程度不同地与我们合作。

3、帝国主义力量。打仗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美国就要同英国、法国争夺殖民地，争夺亚洲、非洲，他们的方针与我们的估计不约而同，好像是我们叫他们这样做。

主要的冲突地区有：一、印度、巴基斯坦，二、叙利亚、摩洛哥，③、中东的广大地区。洛克菲勒的文章对此作了分析，很值得一看。主要目标是争夺殖民地。

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主义

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他们占有全国60%的土地。十大关系中有一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主要要解决大汉族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中共中央准备开中央全会来讨论解决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作风，改变不尊重少数民族的作风。

西藏有一派人要搞独立王国，要去找印度支持，达赖喇嘛动摇了。印度邀请来了，我们做了工作，不听，就让他们去了。英国在印度多伦堡搞了个情报中心，专门破坏我们同西藏的团结。尼赫鲁与周总理说过多伦堡是个间谋中心。我们对走的人说，你们要走也可以，但是对你们不见得好。

我们与西藏有个十七条。西藏的制度一定要改革，但改草要征得你们的同意，你们不同意改就不改。第二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改。第三五年计划期间改不改，也得看你们的意见，要改即改，不改即不改，为什么要那样着急。

十二、建设和人民生活

中国可能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初步改变面貌，对工业化，苏联有一个路线，我们也有个路线。我们与苏联做法上有一些不同，在«十大关系»讲话中，我讲过这个问题。主要是重轻农的投资比例适当，苏联重轻农的比例是9：1，重工业是九，轻农是一，对农民有竭泽而渔的味道。当然这是为了国家建设。但农民积极性不高，市场不够兴旺。重工业市场在哪里?在轻工业和农业那里。中国有五亿农民。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轻农的比例是8：1，实行结果是7：1，我看第二个五年计划搞成6：1比较好。是否可行，请国务院同志研究一下。我没有专门研究。

轻工业和农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也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重工业。原材料没有，市场没有，怎么搞重工业!

重工业应当为优先发展，6：1还是优先发展。仍然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但是走了一点新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重工业投资比例比苏联小，速度要比苏联慢一些，但实际上可能反而要快一些。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里，我们有比苏联发展速度快一点的可能。苏联在旧俄时代的1913年，是400万吨钢，1921年恢复到400万吨钢，1941年增到1800万吨，比旧俄增加1400万吨。即21年增加了1400万吨，我们的老底是90万吨钢。1950年统计的，主要是日本人在东北搞的。从1950年起如果能有21年的和平环境，像苏联那样，那么1950年到1971年，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可以断定，我们的钢不止1千8百万吨，可能达到2千万吨。当然如果帝国主义不给我们和平机会，天下大乱了，我也就只好打了以后再建设。一开打，就是赤化全世界了。更大的可能是打不起来。

所以在建设方针上走一点迂回的道路可能更好。要让农民吃饱，让市场情况好一点。要多做工作，使农民有购买力。只有农民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轻工业才有原料。农业发展了，轻工业才有市场，化肥才有市场，钢铁才有市场，电力才有市场。也就是说，重工业才有市场，才更能发展。重工业有了市场又会反过来促使农业、轻工业的潜力发挥出来。

我们对革命有较多的经.验，犯过错误，翻过跟斗，有把握。对经济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希望不翻大跟斗，不犯大错误。不用像民主革命时，把苏区90%的地方都丢了，最后来个二万五千里长征。错误是难免的，但不应弄得全国根据地丢了，只剩下陕北等几个小地方。经济建设可以少犯一些错课，犯错误也不用犯那么大的错误，花的代价不那么多，这就是我的要求。现在我们还缺少经验，不知道事情应当怎样做才恰当。许多事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究竟好不好?还要不要继续学。苏联是好的，还要継续学。

苏联还是个好国家。他们帮我们办了这么多的工厂，包括军事工厂。英、法、美帮了我们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帮我们设计这么多工厂，建设起这么多工厂。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这样帮我们，能这样帮我们的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缺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和他们是一类国家。我们仍要以学习苏联为主。我们要向一切国家学习，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都要学。各国外语也都要学，单学俄语不够。但主要以学苏联为主。只有他们肯教会我们设计，只有他们肯给我们装备。只有他们能给我们援助。真正帮助我们的是苏联。所以学习苏联是我们的重点。

学习有几种态度。教条主义态度也是学习，好坏一起学。另一种态度是学先进经验。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不对，我们要学先进经验。我们的报刊上并没有提出学落后经验，但有时实际上把落后的东西当先进的经验学来了。这种情况要避免。

要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同亚非被侵略的国家团结，但首先要同苏联团结。苏联可靠。帝国主义国家没良心，不可靠。杜勒斯有什么良心?他很成问题，天天骂我们，把台湾侵占着不放。

好了。几点钟了?七点。三、四、五、六、七讲了四个多钟头了。不讲了。(鼓掌)

(戚本禹记录、整理